

多重选择的世界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嬗变描述

关纪新 朝戈金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多重选择的世界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

关纪新 朝戈金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戴佩丽

封面设计：宝尔金

多重选择的世界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

关纪新 朝戈金 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大厂县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 6 印张 125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3000 册

ISBN7-81001-394-7/I·55

定价：5.90 元

专家推荐意见（一）

本书作者针对当前已有相当数目的鸟瞰式的综述和微观的评析文章的状况，在分析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总体情势的基础上，搜集和考察了大量的文学资料，进行反复、周密的思考，选取若干理论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当代少数民族的作家创作中诸多共性问题，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理性探索。经初步阅读，我觉得这部书稿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本书立论的着眼点，不是仅仅拘泥于单纯的作品分析和欣赏，而是把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创造来认识，进一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的角度、语言发展的角度、美学的角度、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挖掘和探索民族作家文学的内涵和意义；

二、过去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评价、评述较多而理论观照不足，至于这方面的专著则更是少见。这部书稿在理论层次和系统化方面，都较我此前所接触的文章和书籍，有很大的提高，对于今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路的作用；

三、书稿还提出了一些原来没有人涉及的或者“语焉不详”的重要理论问题，这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四、整部书稿的语言生动、明晰、流畅。

总之，这部书稿的学术思考是深入的，时有创见，论述是令人信服的。这部专著具有一定的学术份量。据此，我认为本课题两位承担人所完成的撰著任务，质量是好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前所长

研究员 刘魁立

1994年4月20日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由我所关纪新、朝戈金二人合作撰写的学术专著《多重选择的世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书稿，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进行了系统而周密的思考和研究，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较为精到的阐述，对各民族作家文学的内涵与价值做了多角度的挖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理论见解，在目前已有的关于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预计会对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

该研究成果的著作权，不存在争议。

特此申请我院出版基金给予必要的出版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1994年4月21日

专家推荐意见（二）

关纪新、朝戈金二位撰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是关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性探索著作。它以民族的视角切入文学理论，着眼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实践所涉及的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注意到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广泛学术视野的基础上，去思考有关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综观全书，作者的见解对于深化文学的研究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我以为这部书稿已达到出版水平，特予以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张炯

1994年4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	(1)
第二章	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	(22)
第三章	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传统文化	(53)
第四章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	(74)
第五章	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	(101)
第六章	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	(126)
第七章	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	(146)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

(一)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漫长的文学发展道路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迟到，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出现过自己的作家创作活动，却向来难以获得汉民族雄踞的中原正统文坛的正视和认定；二是，在那相当久远的历史跨度之间，我国现有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又的确不曾有过自己民族的书面创作。于是，人们在谈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常常只是提到一些民族的民间文学成就，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

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曾经熔铸了他们千百年间的生活感受和聪明才智，矗立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的历史峰峦。《格萨尔》（藏族与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等三大史诗，一再地为亚洲古文化赢来殊荣；南方诸民族的创世神话、西北诸民族的长篇叙事诗和东北诸民族的传统讲唱文学，不仅极其丰富，其中许多篇什还堪称人类口承文化的精品。这里有一重鲜明的对比：“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汉族不是完全缺少，就是

只有零星片断”^①。这样，中国文学史在这几方面的空白，便必须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现实留存去填补。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独特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便毫无愧色地呈现出来了。造成上述对比的历史原因有许多，其要点在于，汉民族远在 3000 年以前便有了自己的文字和史籍，故而遏抑了该民族民间口承文化的继续长成和广远流布；而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普遍出现得比较晚，口承文学，也就成了他们世世代代相因传接历史知识、科学文化及艺术体验的重要手段。

正如同人们喜欢把少数民族比喻成“民间文学的海洋”一样，人们差不多也都热衷于把我国的古典作家文学范畴，看成是汉族的“世袭领地”。那灿若星河的汉族作家，汗牛充栋的汉族文学作品，似乎已构成上下几千年间汉族独立支撑中国古典文坛的确凿史实。其实，这种习见的看法，并不尽然。在我们国家悠久的作家文学发展史上，少数民族至少曾经有过如下的重要奉献：

A，较早创制了本民族文字的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在他们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足以光照后世的一批具有高超艺术造诣的文学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当推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作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于 11 世纪），藏族的《萨迦格言》（作者贡嘎坚参，创作于 13 世纪）、《仓洋嘉措情歌》（作者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创作于 18 世纪），蒙古族的《蒙古秘史》（作者待考，创作于 13 世纪）、《黄金史》（作者罗卜桑丹津，创作于 17 世纪）、《蒙古源流》（作者萨冈彻辰，创作于 17 世纪）、《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作者尹湛纳希，创作于 19 世纪），及纳西族的《东巴经》和彝族的《贝玛经》《诗文论》，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源远流长，同时也证实了我国作家文学缘起的多元性。

^① 见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 页。

B,在较早与汉族文化建立交流关系的少数民族中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成功地运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一些人还达到了与同时代的汉族作家互为伯仲的艺术水准。鲜卑族文学家元好问(金元之际)、耶律楚材(元代),蒙古族文学家萨都刺^①(元代),回族文学家丁鹤年(元代)、李贽(明代),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元代),女真族文学家石君宝、李直夫(元代),满族文学家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清代),等等,可以说是这一类型作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成就早已经人所共知,而对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是否可纳入我们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则也随着一个时期以来的有益的讨论和争鸣,逐步趋向于达成共识了。这种少数民族作家不用本民族原有语言而用主体民族的语言写作的见怪不怪的历史现象,恰恰给我国当代同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含有内在规律性的先期预示。

C,历史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文学样式和审美趋向,曾经不断地给汉族文学发展以充满活力的良性作用。远在汉族尚未完全形成前的先秦时期,《诗经》和《楚辞》,便分别融汇了北方华夏诸民族和南方荆蛮诸民族的民族气质和艺术色调^②;及至后来汉族文学中的唐宋词、金元的杂剧和散曲、元明清的讲史和小说,这些文学体裁的相继形成,也各自与当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能动影响,有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少数民族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影响的方面。民族间只要发生交流,总是双向的,互补的。

① 学术界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见,认为萨都刺出身于回族。

② 参见刘俊田、白崇人、禹克坤:《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载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少数民族古代作家的文学成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冷遇，作品被散失和作家被遗忘的情况很多。现在，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所做的重新发掘的工作，方兴未艾，还必定会得到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我们对这项工作的长足拓进抱乐观的期待。也许，只有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轮廓基本复原之时，人们才能够在真正透彻地理解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学的已有贡献的大背景下，从容地去研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规律和趋势。

然而，这样的计议看来又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厘清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轨迹，还有待于迄今仍然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学术工作者的长期努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的一个咄咄逼人的现状，即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狂潮般地涌起，却不能容许人们再有更多的工夫去等待回眸历史的答案了。

(二)

我们把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现实发展，称之为“狂潮涌起”，并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最近十多年内，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存在方式，已经完成了一整套令历史老人为之目眩的重大嬗变：

——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具有自己民族的作家创作记录的，大约只有十个民族；到本世纪中叶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这个数字仅只突破了两三个（这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文学发展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进展情况）；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记录得以提升到二十五个左右（较之建国前大约增加了一倍，但仍未达

到少数民族总数的一半)；根本改写这个数字的举动，终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出现了：几乎有三十个民族的书面文学空白被迅速填满，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由此全部拥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或文学作者)^①。

——以往那种少数民族作家人数不多且零散分布的状况，已经明显地改观。到1993年底为止，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有389人(占该协会会员总数的10.6%以上，高于少数民族总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数8.04%)；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总数，已逾3000人。^②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已具有自己阵容明朗的作家群体。这种单一民族作家群体，从规模上看，少则十数人到数十人(如在“新时期”才形成本民族作家群体的哈萨克族、侗族、景颇族、阿昌族等)，多则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如历史上已有相当程度的作家文学积累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土家族、壮族、白族、维吾尔族、藏族、彝族等)。在一些人数较众的单一民族作家群体的内部，多种多样的体裁、题材、艺术风格，得到了独立的并有着广泛分工的开发。由此，诸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发展将各自形成格局的大趋势，已初见端倪。

——衡量某一民族当代作家文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是要看该民族有无长篇小说的生产能力。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民族智慧风貌的集中显现，它要求作家对本民族历史、现实有一种抽象的概括能力，并以史诗般的气度统摄自己的艺术把握。满族、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是在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时期便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作品的，他们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已达到了与汉

① 本段内所列数字，均系笔者根据多种资料综合而成。

② 本段以上数字，承蒙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民族文学处阿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提供。

族古典小说创作互补互长的程度。然而，对其他的更多的少数民族来说，本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样式的创作定势，却与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艺术机制距离较远。随着人类共同体进入高级别的艺术生产时代的到来，神话与史诗的新创作将不再会出现，民间文学的史诗向作家文学的长篇小说的艺术转换，或迟或早地都要在各个民族的艺术衍进中完成。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占有本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历史地位之后，普遍地感受到，只有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容涵着强大的文化张力的长篇小说，取代短篇小说在本民族文学中的主导位置，才能真正比较巩固地确立自己民族在中国文坛的有力量形象。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纷纷发起对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冲击，其精神，是异常顽强的，令人敬佩的。今天，除上面列举的几个历史上曾经创作出长篇小说的少数民族在持续地扩大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势头之外，已经有回族、土家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朝鲜族、壮族、白族、傣族、苗族、侗族、鄂温克族、瑶族、景颇族、东乡族等民族正式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使已经能够创作长篇小说作品的少数民族，达到了将近二十个。依据这样突进的速度和实力，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正在获得与中原汉族文坛之间越来越强的对话能力。

——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准，通常是由一批最有才华的作家的作品体现出来的。目前，由不同民族的老、中、青年优秀作家共同组成的少数民族创作的骨干队伍，业已成为我国文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生力军。正象人们在回顾 50 年代初期到 60 年代中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开创阶段时，会自然地记起老舍、纳·赛音朝克图、李乔、铁衣甫江、玛拉沁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祖农·哈迪尔、关沫南、陆地、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木斧、郝斯力汗、唐加勒克、杨苏、晓雪、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李惠文、胡昭、汪承栋、汪玉良、韦其麟、高

深、金哲、任晓远、李根全、饶阶巴桑、吴琪拉达、包玉堂、康朗甩等等名字一样，在议论起“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人们也会同样亲切地谈到张承志、乌热尔图、孙健忠、朱春雨、扎西达娃、蔡测海、伊丹才让、益希单增、降边嘉措、赵大年、理由、柯兴、马云鹏、霍达、韦一凡、伍略、石太瑞、夏侃、金成辉、马犁、林元春、韩秋夫、李传锋、艾克拜尔·米吉提、陈村、沙叶新、吉狄马加、查干、南永前、巴彦布、佳峻、阿云嘎、白雪林、哈斯乌拉、勒·敖德斯尔、乌雅泰、萨仁图娅、察森敖拉、祖尔东·萨比尔、柯尤慕·吐尔迪、穆罕默德·巴格拉西、买买提明·吾守尔、贾合甫·米尔扎汗、朱玛拜·毕拉勒、吾拉兹汗·阿合买提、孔盖·木哈江、夏莫斯·库玛尔、杨世光、戈阿干、张长、那家伦、钟铁夫、严亭亭、景宜、苏方学、黎国璞、黄钰、蓝怀昌、莫义明、马瑞芳、马连义、石定、罗国凡、罗吉万、颜家文、江浩、边玲玲、穆静、中流、满锐、关庚寅、查舜、马自祥、李必雨、杨明渊、刘荣敏、滕树嵩、潘俊龄、熊飞、吴雪恼、征鹏、丹真贡布、多杰才旦、意西泽仁、丹珠昂奔、色波、阿来、陈川、贺晓彤、田瑛、鲍义志、金勋、于德才、那守箴、孙春平、张桦、林和平、尚静波、王家男、何培嵩、孙步康、岑献青、莫非、陈多、冯艺、黄神彪、包晓泉、龙敏、王延晖、马明康、石锐、晨宏、岳丁、玛波、存文学、雷德和、海涛、艾扎、董秀英、密英文、孙宇飞、拉木·嘎吐萨……。正是在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名字之下，曾经发表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文学佳作，有些出手不凡的作品还在文坛上激起过轰动效应。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各级各类文学奖励的名单上。连国家级的几种文学大奖中，也总是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席位，截止1993年底，少数民族作家已有31人次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全国中篇小说奖、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诗歌奖和全国报告文学奖。而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

一、二、三、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评比中，已有来自52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获奖438人次。^①

——在上述业绩取得的同时，参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这样一条新的战线已经全面铺开。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民族文学》杂志；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杂志；许多地区和若干民族，也相继创办了自己促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刊物，开展越来越富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伴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力量的迅猛崛起，包括少数民族成份、汉族成份乃至海外成份的当代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队伍和作家作品评论队伍，开始集结并发挥了作用。用某些种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地通过翻译工作者的劳动，被介绍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中去，被介绍到国外读者中去。当代少数民族的作家创作，已经拥有了广泛的且不断发展着的读者群。今天，完全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再也不象十几年前那样，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字眼了。

以上，是我们对发生在这片国土上十多年来“狂潮涌起”般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性嬗变，所做的一幅粗线条的素描。凡有幸亲眼目睹这场文化变迁景观的人们，特别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有眼力的中外文化界人士，无不为之惊奇和喜悦。有人用“千载难逢”、“蔚为壮观”，来形容自己与这一民族文化大事件邂逅时的兴奋感受，想来是并不夸张的。诚然，自有人类文化史的记载以来，有人曾经亲笔记录过这样的历史镜头吗：在一个国度之内，数十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形态，在历史的瞬息间完成了如此辉煌的嬗变？

^① 上述少数民族作家获奖的情况，亦承蒙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提供。

(三)

惊喜是自然的。惊喜之余，我们认为，应当对这场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性嬗变的原因，做一些考察。

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发展速度的高低，常常要受到它所处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因素的直接制约。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各民族间在经济与文化的成长上，便是极不平衡的。在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也是颇为突出的和相当普遍的。总的来说，汉民族由于人口众多，古来便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广袤的中原内陆及沿海地带，很早就普遍地进入了农耕生产状态，于是在与诸少数民族的经济竞争中一路领先，并在民族文化的演进中也经常处在前列的位置。而生存条件相对说来较为恶劣的山区、高原、戈壁乃至高寒地带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寡，生产力也相对低下，在长期的民族相互折冲中，又往往处在不利态势，故而使其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处于一重又一重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了一种持续既久的历史事实。世代以来，各少数民族为改变自己多方面的后进被动状态，曾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有的民族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把自己与汉族之间的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缩小了，然而，就大部分少数民族而言，它们在总体上与汉族之间的“不平衡”状况，还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所要注重观察的各民族的文学，作为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现象，当然地，也会因为不同民族的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存在差异。在这里，民族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每一个民族，不管它自身发展层次的高下，都只能具有与自己民族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只能具有与自己民族经

济和文化相适应的文学。

各个民族的文学有他们相通的内在发展规律。大约在人类原始社会内氏族社会末期的时候，在语言已经产生并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民间文学，这种通过人们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即告产生。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已知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从它问世的那一天开始，便成为切近和反映人们社会生活和思考认识的产物，成为表达和传递人们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的产物。在人类共同体由野蛮、蒙昧逐步走向文明、智慧的不同阶段中，民间文学作为各民族的观念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在由氏族社会向部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学曾伴随着初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的更迭，先后出现了神话创作的繁荣和史诗创作的繁荣，并分别赢得了它们为后世无法摹仿无法替代的艺术价值。而当人类前行的步履一旦走过那“神秘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历史过程之后，神话和史诗的创作繁荣也就再也无可复制了，民间文学也就告别了它最为骄傲的创作经历，走上了以童话、故事、寓言和诗歌为主要艺术形式的平凡的创作道路。

与后来出现的作家文学相比较，民间文学具有它一系列的特征。从创作和流布的角度去观察，它的集体创作性、口头传播性、环境变异性 and 世代承袭性，都是很鲜明的；而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去观察，它的以实用性为基本要求而以教育性、审美性、娱乐性为辅的复合功用的性质，也是十分确定的。上述这些特征的形成，固然很是有利于民间文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利于满足各民族人们在相当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对这种文学样式的综合需求，但是，也正是这些特征本身，却又不可避免地给这种精神文化类型在固有的形态之内向更高级层次的进取，设置下了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由于民间文学对世界的艺术把握，在其历史起源处便同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艺术活动是与非艺术活动